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现代新儒学的根基

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儒

96636

B244.05
9

DG13/35

——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

现代新儒学 的根基

郭齐勇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郭齐勇编.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12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方克立主编)
ISBN 7-5043-2813-8

I. 现… II. 郭… III. 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IV. B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152 号

现代新儒学的根基

——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

郭齐勇 编

责任编辑 罗林平

责任校对 陈丹桦

封面设计 李 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真武庙二条九号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17.25 印张 383 (千) 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043-2813-8/G · 1056

定价: 19.80 元

(京) 新登字 097 号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方克立

副主编 张品兴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克立	宋连昌	宋志明	余新华
张品兴	罗林平	郑大华	郑家栋
高聚成	徐少锦	焦树安	

总序

五年前，“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儒家”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名词；在今天，它们不仅已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报刊上、书册中，而且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新热点。

现代新儒学本来是70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大陆产生、经过了30年奠基和发展的一个学术思想派别，它的前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都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解放后，作为一个思潮和学派来说，因其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而不可能在中國大陸继续存在和发展，它的阵地遂转移到了港台和海外。而就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来说，现代新儒学并没有断绝薪火；在第二个30年它又经历了新的重要的发展阶段，进入80年代以后更有进一步走向世界

界、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的趋势。由于海峡两岸隔绝 30 多年，国内的读者对这些情况均难以知悉，并在一再“批儒”的气氛中对这种思想感到十分隔膜。

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域外的各种思潮蜂拥而入，这种本来就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并以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为旗帜，以解决传统和现代化、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为宗旨的思想学说，自然不会放过回归本土的机会。主要是通过一些海外华裔学者的努力，积极推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儒学复兴”说在 80 年代中国的文化讨论中俨然成为了一派显学。文化讨论的现实感受加并不遥远的历史的回顾使人们很快地接受了“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概念。

关于现代新儒学，现在人们谈论得很多，但是由于研究刚刚起步，资料掌握还很不齐全，特别是对于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家学者，研究资料尤其匮乏，因此人们的认识难免是笼统浮泛的、很不一致的，包括现代新儒家的对象、范围、代表人物、发展阶段、思想特征、历史评价等问题，在认识上都颇多歧义。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诸如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开新，对近现代西学的融摄和“儒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敌视和某种意义上的启示；这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派别是怎样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的，它对文化现代化的贡献是什么而限制又是什么，它将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等等，都有待于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逐步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才有可能作出切实的回答。

对于一切研究者和关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人来说，占

有最基本的研究资料、原原本本地弄清现代新儒家学者都写了和说了些什么乃是首要的前提。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精选的系统的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第一手资料。它不同于国内已经出版的众多新儒学评论集、港台海外新儒家论文选集和新儒家个别著作的重印本，而是力图从反映整个思潮发展的角度，将现代新儒学各个阶段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作挑选出来，分别汇编成册，以便读者准确地把握其新儒学思想的实质及其个性特征。为了帮助青年读者正确认识复杂的思想文化现象，各册编者分别撰写了“编序”，除了介绍一些基本情况外，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有关思想资料作了初步的分析和评论。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采取了广义理解的“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概念，即超越了新儒家学者之间的师承、门户之见，把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作是现代的新儒家。这套“辑要”所选的十五位作者，涉及“五四”以来的三代人，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是相当明显的，但是都不乏上述“共性”。他们中的马一浮、方东美、余英时、成中英等人，能否归属于现代新儒家的范畴，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这里提供了一批反映其新儒学思想倾向的资料，特别是集中反映其现代新儒学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希望有助于对他们的思想特质和精神方向作出符合实际的定性判断。当然这决不是说，他们的思想不可能包含矛盾，不可能表现出多样的形态，但这些资料至少对了解他们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是有帮助的。

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论争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作一种简单的是非评判，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一条更有效的、更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可动摇，怎样更好地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利用我们传统的资源，怎样更好地吸收别的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经验和域外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包容性最大的、最富有民族特色和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以宽阔的胸襟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致力于民族振兴、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并且也确实在某一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的思想派别，包括那些曾经批评和反对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哪怕只包含着片面的真理，也应该加以厘清，加以肯定，批判地借鉴和吸收。现代新儒学在维护和弘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融合中西哲学和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等方面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份思想财富我们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和批判地继承。所以，这套“辑要”决不只是为读者提供一套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而应该看作是中国人的现代智慧的一部分，是一套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名著。所选15位作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都堪称名家，把他们的代表作称为“名著”并非言过其实。当然，“名著”中所写的不见得都是真理，我们也不赞成“复兴儒学”的观点，但是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来研究，包括它的错误亦能给人某种启迪。如果大家能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出版这一套书的价值和意义也就

是不容置疑的了。

方克立

1990年11月8日

编 序

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本世纪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出身于鄂东黄冈县贫瘠的乡间，自幼及长未曾受到过（传统的抑或近代的）正规教育。辛亥革命以前，他曾有一段传奇式的反清斗争经历。这两条，是他迥异于本世纪其他哲学家或学术史家的地方。

先生个子不高，瘦弱，面清癯，天庭饱满，眼大，目光炯炯有神，胡子半尺。常穿一件灰布长袍，喜与二三素心人漫步江边、田野、山林，或无语沉思，或侃侃而谈，或大笑不止，或嚎啕痛哭，或骂声不绝……人们都说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又有人以“仙风道骨”四个字来形容他的风貌。

一、下层生活的体验 忧患意识的结晶

与学院派的讲堂教授不同，熊十力是来自民间，来自社会最下层，亲身体验了民间疾苦，并把这种体验、感受融进其哲学创作中去的直感型的哲人。他特别表彰庶民在穷苦中的志气与品德，一生不与达官贵人周旋，鄙薄那些随人俯仰的所谓“名流”。

他们家世代贫困。父亲以上三世皆单丁，都无立锥之地。他的祖父敏容是乡间木匠，父亲其相则掌教于乡塾。其母生男六，先生行三。先生幼时为邻家放牛，只是在父亲和长兄仲甫的教育下才粗通文墨。他十三四岁时，父母贫病交加，又遭恶霸陷害，相继辞世。

十力很早就养成了勤奋自学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十六七岁之间，游学乡间，捧读陈白沙书，对“禽兽说”感受很深。他领悟到，人生的使命和价值不在饥食渴饮、争权夺利，而在超脱物欲，自识至大无匹之真我，如此才能做到与天地万物合其德，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当年读白沙书，“忽起无限兴奋，恍如身跃虚空，神游八极，其惊喜若狂，无可言拟，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

此时，邻县有某孝廉上公车，每每购置新书回里，十力常去借阅。读到“格致启蒙”之类，大开眼界，遂视六经诸子为土苴，睹前儒疏记，且掷地而骂。又读到当时维新派论文和奏章，知世变日剧，即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书置座右。清末政治腐败，民族危机深重。十力捧读严译

《天演论》，深为“物竞天择”“自强保种”的召唤所感染。同时，“读船山、亭林诸老先生书，已有革命之志，遂不事科举而投武昌凯字营当一小兵，谋运动军队”。

1900至1901年间，十力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三青年身居社会下层，同情劳苦大众，养成叛逆性格。他们英姿英发，指点江山，时常借题发挥“群龙无首”：“人各自立，人各自主，则群龙也；天下不得有君，故无首也。”为强国富民，改革社会，他们一面游学，一面为创立革命团体而奔走呼号。何自新主张运动军队，十力力表赞同并以身先之，投第三十一标（即上说凯字营）当兵。十力白天上操练武，夜间读书看报，撰写文章，给报馆投稿，主张变革现实，救亡图存。

1904年7月，张难先、何自新等在武昌创立革命党团——科学补习所。1905年春，王汉刺杀清阅兵大臣铁良于彰德火车站，未果，壮烈牺牲。是冬，十力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仁字斋为学兵。由于操课在校，就寝在营，各营士兵接触频繁。十力利用这一机会宣传革命，联络同人，揭露清吏。他曾在学堂揭示处张贴了揭露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罪恶的小字报。

1906年2月，刘静庵、何自新等在武昌成立日知会，得到东京同盟会的支持。是春，十力加入同盟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该社即成为日知会的外围组织。社员不限于黄冈籍同志。他以订兰谱的方式，联络军学界志士。十力主持了该社的活动。每星期日，社员集会，十力等以孟子、王船山、黄宗羲思想阐发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借讲《春秋》辩论种族关系，借讲《周礼》提倡地方自治。熊氏领导

社员在军学界宣传《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和黄冈籍同人改写的《孔孟心肝》等。当时有人认为武昌不易发动革命，十力与自新力辟其谬。

是夏，十力肄业于陆军特别小学堂。他提出，暗地联结荆、襄、巴、蜀及河南秘密会党与洪门哥老会等，使之发难于各地。清廷必遣军队去围剿，而军中同志即可乘机举事，中原不难光复。熊氏为此奔走军中甚力，响应者众多，风声渐大。不久事泄。十力被鄂军通缉。张彪等悬赏五百金购熊氏头颅。幸有友人事先暗通消息，秘密掩护，十力得以出逃。

事稍缓，十力归乡授徒。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十力参加了光复黄州的活动，后到省城武昌出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年腊月，在一次黄冈籍辛亥志士的聚会上，熊氏挥毫，书写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八个字抒发心志。他在这里借用佛门弟子颂扬释迦牟尼的话来表明辛亥志士的一种主观战斗精神。“唯我独尊”的“我”字在这里应作“大我”或“个性”解，反映了熊先生一代人的时代觉悟。同时，这也反映了熊先生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是孔子所谓“狂者”。这种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和率真，伴随了熊氏一生。

民国元年，十力参加了编辑日知会志的工作。次年，二次革命失败，熊氏回到江西德安（自1906年始，熊氏家族迁居德安）。此后，垦荒耕田，攻读先秦诸子和商务印书馆翻译的西方哲学书，亦教过一段时间的私塾。

熊氏衷心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向往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篡国，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熊氏与人书曰：“今之执政，不学无术，私心独断，以逆流为治，以武力剥削为能，欲玩天下于掌上，其祸败可立俟。”

1917—1918年间，孙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熊氏由江西入湖南参与民军，支持桂军北伐，抗击段祺瑞的进攻。不久即赴粤，佐孙中山幕，奔走于两广、西南。十力目睹“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痛惜鼎革以还，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官方败坏，军阀官僚贪污、淫侈、残忍、猜妒、浮夸、诈骗、卑屈、苟且，党祸至烈、士习偷廉，民生凋敝，人道灭绝，慨叹“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熊先生“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氏一生中重要的转折。先生自称“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1918年，十力由广州返回德安，流寓匡庐西麓，题壁曰：“数荆湖过客，濂溪而后我重来。”是年，他的处女作《心书》自印行世。是书汇集两年多来的二十五则笔札。蔡元培先生亲为之序。蔡、熊二人当时都有道德救国的思想。先一年，蔡先生创进德会于北大，熊氏“由远道贻书赞助，极声应气求之雅”。此后蔡先生经常关心熊氏，给予他许多帮助。

1919年前后，熊氏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笔墨官司促成了他与梁漱溟的相会，并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由于梁的介绍，1920年秋至1922年秋，熊十力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当时是金陵刻经处研究部）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习佛学，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的基础，接受了理性思辨的严格训练。1922年，执教北大的梁漱溟打算抽身自己办学，征得蔡校长同意，去南京请欧阳门下高足来北大顶替自己讲授佛教

唯识学。借此机缘，熊氏得以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这为他锻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只有在北大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只有在蔡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政策下，熊十力才得到了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

熊十力的中年时代是沉潜冥思、自立权衡的时代。他决不随波逐流，亦不囿于陈说。从1918年到1922年，他经历了由儒转佛，直从大乘有宗入手，后舍有宗而深研大乘空余的学术历程。1923到1932年，则是熊十力酝酿、营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关键年代。熊氏在北大讲授法相唯识之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点，一步一步背弃师说，由佛归儒。我们现在找到熊先生1923、1926、1930年三种《唯识学概论》的讲义，从中可以窥见他的思想演变辙迹。1930年，他的弟子编辑整理了他在1924—1928年间的论学语录、笔札，以《尊闻录》为名，在北京自印行世。1932年10月体大思精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终于在杭州出版，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行。这是熊十力哲学成熟的标志。

对于这一创造性的哲学系统，马一浮和蔡元培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序指出，是书“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确然有见于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靡枝辞，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辟成变之义，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拮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以熊十力比之扫除经学烦琐之风、阐发周易哲学大义的王弼和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宗的创立者龙树，而把道生、僧肇、玄奘、窥基等著名佛学理论家置之于不在话下的地步，真可

谓推崇至极！蔡序论述了近代佛学的趋势，认为以铜和泰、陈寅恪为代表的佛学研究者是考据派，以欧阳竟无之内学院为代表的佛学研究者是经院派，前者没有发挥微言大义，后者未敢参加批评态度。“当此之时，完全脱离宗教家窠臼，而以哲学家之立场提出新见解者，实为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蔡元培说，佛典中有高深的哲理，“惜二千年来为教界所限，未有以哲学家方法，分析推求，直言其所疑，而试为补正者。有之，则自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始”。蔡元培对于熊氏之出入于佛学的哲学家气魄和贡献，许之甚高。

《新论》文言文文本出版之后，内学院师友及各派佛学界人士，几乎群起而攻之。在论战中，熊十力以儒家人文主义及其刚健辩证法的精神，批评了重灭而不重生、蔽于天而不知人、消极遁世、脱离现实的佛道二家，尤其是“寂灭寂静”的心性论和以“分析术”肢解整全的心体与性体的唯识学思维方式。这在表层上是批判唯识学，在深层上则是回应西学、批评西学。笔者在拙著《熊十力及其哲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中最早指出了这一点。熊先生治学的特点是不依经傍传，不拘家派，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资料都有所取、有所破，意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创造力，以吞而食之和取而代之以的气魄成为现代哲学之大家。此外，他的《佛家名相通释》（1937年出版）也被公认为治佛学的津梁。

“狂”确乎是熊先生的一个突出的个性特征。大约在1925年前后，他为自己更名为“十力”（此前叫“子真”，更前叫“升恒”）。“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的话，比喻他具有超群的智慧、无边的神力。沈约《内典序》也有

“六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之说。自20年代末期开始，熊先生著作常常自署“黄冈熊十力造”。这个“造”字，在印度是被尊为菩萨的人才能用的。

“悲”——悲天悯人，具有博大的同情心，是熊先生的另一个突出的个性特征。对亲人、弟子、人民、民族执著的爱，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的悲情，使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凡是熟悉他的人，对于他的“哭”，都有特别深的感受。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熊先生装扮成商人，由学生刘公纯陪同，从北平城南出逃，乘运煤的货车，历经艰辛，回到武汉。其间遇到瓢泼大雨，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先生痛哭华北的沦丧，大骂蒋氏政府不抗日，号召乡邦后进拿起武器抵抗侵略者。1938年春，先生入川，在颠沛流离之际不废讲学，与学生邓子琴等讲民族精神、种原及通史，砥砺气节，确信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因作《中国历史讲话》，力图为全民族团结抗战提供历史依据。

抗战期间，先生生活穷困，然却凭着他对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挚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他的忧患意识、乐观精神，他的全部的真情实感都倾注在中国文化的存亡继绝之上。熊先生以大无畏力，平章华梵，融会佛儒，自创新论，于西化之风狂飙突进之年代，为改造东方旧学，开辟新途，可谓孤往直勇，用心良苦。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哲学，这就是他创制体系的出发点。他对于“五四”运动之后菲薄固有、“全盘西化”的倾向和所谓“本位文化”的主张均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两派其实都不懂“西方之真”和“何者为国之粹”，指出必须深切了解西方人所以成功现代文化之根本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讳短，不掩长，相